



为西学东渐鼓与呼的 第一个留学生 ——容闳

中华英杰谱 · ZHONG HUA YING JIE PU

在中国近代史上,容闳是第一个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情况一无所知的时候,他能够洞悉世界发展的趋势,大力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28年(清道光八年)生于一个贫民之家。容闳的家乡与澳门仅一水之隔,这里是外国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容闳7岁时被送进澳门一家外国教士办的小学校读书。1841年(道光二十一

年),容闳又到澳门另一家外国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念书。容闳天资聪颖,加上比较勤奋,学习成绩很好。该校校长美国人布朗先生对他十分赞赏。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布朗先生要回美国休假,他希望带上几名中国学生去美国深造。容闳征得家人同意后决定赴美求学。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容闳随布朗先生动身赴美,同行的还有容闳的同学黄宽、黄胜。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到美国后,容闳等人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森中学学习。1850年(道光三十年),容闳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容闳各门功课都取得优异成绩,还获得过校方奖励。1854年(咸丰四年),26岁的容闳大学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在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容闳谢绝了美国一些人士的挽留,毅然决定返回中国。他要用学到的知识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他要实现把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的愿望,“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5年(咸丰五年),容闳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当时的中国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军同清政府浴血奋战的时候。容闳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业,只好在香港、上海等地呆了一段时间。在对国内形势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容闳感愤于清政府屠杀人民的暴行,并怀着对新生的农民政权的同情,于1860年(咸丰十一年)11月来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主持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亲切会见了容闳。他们过去在香港有过交往,老友重逢,十分投机。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希望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利事业之发展与中国之进步。容闳还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能够进行这些改革,他则准备为太平军效力。洪仁玕高度评价了容闳的建议,不过他也表示,限于当时的条件,实行这些改革是有困难的。后来容闳意识到在太平天国是无法施展自己抱负的,便告别了洪仁玕,离开了天京。

这时,清政府大官僚曾国藩正兴办洋务。他在安庆开办了军械所,延揽了许多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创办近代工业。经友人介绍,容闳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容闳对在中国发展机器工业之创举非常高兴,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曾国藩对容闳的品行和学识比较满意,随即派他出国购买机器设备。容闳奉命去了美国,四处奔波,多方联系,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买回的机器设备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为此清政府授予容闳五品候补同知官衔,他成为著名的洋务活动家之一。

1870年(同治九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一个“留学计划”,以期为中国培养一批近代化所需的专门人材。曾国藩对此十分重视,并上奏清政府请求批准实行。不久,清政府批准在上海设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按照计划确定留学生名额共120人,分四批派遣,每年派30名。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1872年(同治十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名启程赴美。随后的90名也如期派出。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事情,是同容闳的努力分不开的。留学生到美国后分别入中小学校学习。数年后不少人考入高等学校,学业上的进步十分显著。容闳对留学生们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关心无微不至,他们之间“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

1873年(同治十二年),秘鲁政府派特使来华,要求与清政府签订关于招募华工赴秘的条约。清政府派容闳与秘鲁特使谈判。容闳在谈判中揭露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真相,力阻签订此项条约。随后容闳又奉命亲赴秘鲁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以许多确凿证据驳斥了秘鲁特使的谎言,促使清政府宣布禁止华工出洋,容闳为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做了一件好事。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容闳为驻美国副公使,同时兼管留学生事务。经过多年的学习,留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文化,思

想渐渐有了变化。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一些陈规陋习十分反感,言行中不免带有叛逆情绪,这些不可避免地遭到陈兰彬以及后来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的强烈反对。朝野的其它一些顽固派也借题发挥,从中作梗。清政府遂于1881年(光绪七年)撤消了留美学生事务所,命全体留学生回国,容闳经办多年的“留学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尽管如此,容闳的心血并未白费,因为这些留学生多数都学有成就,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专门人材。同时,这件事对当时愚昧守旧的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巨大冲击。

此后,容闳在美国闲居了几年。他常为怀才不遇和无缘报效祖国而苦闷,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大洋彼岸的中国。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在美国的容闳为此焦虑万分,他曾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提出筹款、购舰、对日作战等项建议,但未被采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容闳又一次回到中国。他先后向清政府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建议,又因为遭到掣肘而不能实行。

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也引起了国人公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方兴未艾。容闳在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密切交往,共谋变法大计,容闳的住所经常成为维新派人士集会的地点。容闳也被大家视为学习西方的先驱,倍受尊敬。时隔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政变,幽禁了主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为了挽救危局,梁启超、容闳曾分别去日本、美国公使馆求援,但未获响应。在顽固派大肆搜捕维新派的形势下,容闳只好逃到上海。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在上海召集社会名流开会,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拥立光绪皇帝。容闳出席了会议。大家选举容闳为“中国议会”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不久,自立军起义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镇压了,唐才常不幸遇难,容闳逃往香港。

在遭受了多次挫折和打击之后,容闳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思想逐步转变为同情革命的立场,认为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才能给中国的进步开辟道路。1900年夏,容闳在去日本的轮船上初次会见了孙中山。二人彻夜交谈,纵论古今,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俩畅谈了发动反清革命,谋求中国的民主自由理想,互相勉励要为中国的发展奋斗不息。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容闳再次赴美。他广泛联系美国的华侨支援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他也曾劝说一些美国友人给中国革命以支持。1909年(宣统元年),容闳在美国又会见了孙中山。他们共同商讨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容闳承担了筹款等任务。这对孙中山的革命热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这些年中,年近80岁的容闳回顾并整理了自己的生平经历,用英文写了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名为《西学东渐记》)。

1911年(光绪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取得了初步胜利。83岁高龄的容闳得知这一消息异常兴奋,他在《致全体革命者》的信中写道:“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解除人民的疾苦,去争取自由和独立。”同时他还告诫革命党人,必须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保持警惕,防止断送革命的成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2月,孙中山给容闳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他“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才智学识达练过人”,并恳请他回国,“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容闳对此深感欣慰,但遗憾的是他已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城逝世,享年84岁。他被安葬在哈特福德城西带山公墓。

容闳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史的前80年。在这个中外冲突、

风云变幻的时代,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先后向西方寻找真理,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容闳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容闳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怀着对自己祖国的特殊情感,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全部力量,他是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容闳又是一个能够顺应历史潮流逐步前进的人,他曾参加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在不同时期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的这种与时代俱进的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缩影。

(关 威)